

研究秋白，一往情深

——追思丁景唐先生

■赵庚林

寒潮来袭，长街上飞扬着落叶……2017年12月11日，享年98岁的丁景唐先生(1920.4.25—2017.12.11)，在上海华东医院与世长辞，“大休息了”(瞿秋白语)。

去年6月，刚送走王观泉先生，仅隔数月，又痛失一位前辈大家。半年内，国内瞿秋白研究领域两位顶梁柱式的专家接连西去，令人唏嘘，我无奈而郁闷得透不过气来。

上月15日凌晨，我随瞿秋白纪念馆特派代表唐茹玉赶赴上海参加追悼会，向丁老鞠躬告别。细雨洗尘，双眼朦胧，瞬间，累积多年的记忆被激活、闪现……

2009年6月，王观泉先生应邀来常州参加纪念秋白的活动。我问起丁老身体可好？他说：“挺好。我每来常州，都要去看他。他都表扬你这个馆长当得好！”我说：“纪念馆的成长和发展都离不开他的鼎力相助！”

瞿秋白纪念馆建于1985年6月18日，即瞿秋白就义50周年纪念日，当时只是仅三人编制的小馆。1987年10月，我调任瞿秋白纪念馆，准备创办《瞿秋白研究》(年刊)，便写信恳求丁老为创刊号赐稿。丁老竭力支持，还要求女儿言昭、儿子言模也要写，先后寄来了丁老的《〈瞿秋白——民族心海的灯塔〉序言》，丁言昭、陈挥《瞿秋白的编辑生涯》，丁言模《论瞿秋白“第三次文学革命——文艺大众化运动”》。三篇文章都编入了《瞿秋白研究》创刊号。

提及建馆初期丁老的大力支持，观泉先生告诉我一件趣事：“你刚任馆长时，丁先生对我说，今朝要讲桩滑稽事体拨依听听。”“瞿秋白纪念馆的馆长，是一个滑稽剧团的书记来当的，滑稽勿滑稽？”“不过，丁先生强调：‘随便啥人当馆长，阿拉全要支持格，因为瞿秋白面子大。’”

这让我一下子想起初次登门拜访时，我恳切希望丁老多关心、支持纪念馆的工作，“怎样研究，还望您多指教。”丁老举重若轻：“研究嘛，就是搞搞清爽！”我的理解是，人们已知的而自己未知的，要搞清爽；人们和自己都未知的，能搞清爽就更有价值了。言简意赅，令我终身受益。

1937年，北平沦陷。潘光旦抓紧做了四件事。其一，将近五六年来所作关于优生学的短篇文稿169篇编成《优生闲话》，约二十万言，并拟将之纳入其“人文生物学论丛”系列，列为第四辑，仍拟交商务印书馆出版。其二，将《笔记小说大观》中剪贴的资料分类编订为二十余册。其三，准备将《笔记小说大观》再度快速浏览，剪存有用的资料，经两次爬梳，不再保存该书，即使散佚亦无遗憾。但可惜的是，当年9月中旬必须离开北平南下时，他仅完成全套书500本的一小半部分。其四，关于科举人物的血缘关系研究课题，他研究“巍科人物之血缘研究”，又找到不少资料。



1995年6月18日，瞿秋白就义60周年纪念暨学术讨论会在北京龙泉宾馆举行。会后，部分专家学者合影，左起：孙克悠、丁景唐、瞿独伊、温济泽、温飏、赵庚林。

右图：1990年1月，本文作者赵庚林向丁景唐先生(右)赠送《瞿秋白研究》。



(照片由本文作者提供)

二

我到纪念馆任职，在瞿秋白研究领域，人生地不熟，更不知如何入门，唯有边学边干。

1989年2月16日，我带着新出版的《瞿秋白研究》创刊号登门求教。那时，丁老已离休，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名誉社长。他个子不高，说着浓重宁波口音的上海话，不时问：“我讲格话懂不懂？”“伊拉徐州请我做报告，听勿懂，最后是言昭做翻译。真滑稽！”丁老慈眉善目笑嘻嘻，长者风范书卷气，轻声细语悠笃笃，书香屋里亲如己。即使讲些有分量的话，也是语气平和，给听者留下足够思考的空间。

当晚，他说：“今朝要拨依看一样宝贝。”他从柜中取出，打开层层包装纸，原来是鲁迅抱病编的瞿秋白译文集《海上述林》，是出版100套的版本，亚麻封面(底)、皮脊，烫金本。当时我看了心里很震撼，事隔半个多世纪，仍能从中感受到鲁迅先生对瞿秋白先生的真感情。还有瞿秋白《新俄国游记》(原名《俄乡纪程》)1922年9月商务印书馆初版本和《赤都心史》1924年6月商务印书馆初版本。丁老对瞿秋白著作视同珍宝，说：“资料要好好征集，这是

研究的基础。”

次日，丁老带我去华东师范大学拜访冯契、钱谷融、许杰、苏渊雷等教授和王铁仙、季甄蓀，赠送《瞿秋白研究》创刊号，听取他们的意见。

2月19日下午，丁老在他的卧室兼书房“怀白楼”，组织了瞿秋白研究新春茶话会。周永祥、王关兴、陈思和、陈福康、曹予庭、康锋、陈挥、钱世锦、吴幼英、丁言昭等十余人参加。大家边翻阅《瞿秋白研究》创刊号，边提出改进意见和热切期望，丁老更是希望大家关心纪念馆，支持《瞿秋白研究》。

这哪像第一次见面啊，丁老分明像老朋友一样热情帮忙。为了瞿秋白研究，丁老把他在研究方面的人脉一一向我介绍，动员大家积极参与，为我日后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。

三

1989年，常州准备在纪念瞿秋白90诞辰学术讨论会召开之际同时举办纪念瞿秋白90诞辰书画展，3月8日向全国著名书画家寄发了“募征纪念瞿秋白书画”专函。

3月15日，我为此再度拜访丁老，他仍是热情地满口答应：“凡我熟悉的，都请他们写。”随

后，他向北京、上海的臧克家、许杰、许觉民、顾廷龙、周艾若等前辈和挚友或写信或登门拜访，言昭、言模同时帮助征集。丁老将他代为征集甚至他个人珍藏的郭绍虞、赖少其、陶白、戎戈的书画20余幅都赠给了纪念馆。正是在丁老的鼎力帮助支持下，书画展与学术讨论会顺利举行，收到了预期效果。事后得知，丁老在翻箱倒柜中，把腰也扭伤了。

同年7月18日，我第三次去丁老家。他见面就问：“格趟来又有啥事体？”我说：“希望《瞿秋白研究》能公开出版。”他便推荐了学林出版社。次日，言模陪我去学林出版社总编辑柳肇瑞家拜访，最后与雷群明社长、柳总编商定了合作事宜。到我退休前，在我主持编辑的12辑《瞿秋白研究》中，除了创刊号，其余均由学林出版社公开出版。

四

我每次去上海送书稿，或去鲁迅纪念馆参观学习，丁老总是主动问我，有什么事需帮忙？只要你提，他一定有求必应。

他让言昭陪我去七浦路看望在沪治疗眼疾的王观泉；得知我想参观秋白在上海住过的地方，他主动带我去秋白在1931年6

月由冯雪峰安排曾居住近两年的南市紫霞路68号谢且如家旧址、1932年11月秋白在北四川路底避难的鲁迅故居，以及鲁迅为秋白代租的东照里12号旧址；我想拜访见过瞿秋白的人，他就带着我看望杨之英以及谢且如的遗孀钱云锦。丁老提携晚辈，热忱中寄寓着厚望。

自1988年2月21日起，在我主编的159期《瞿秋白研究信息》中，经常可看到丁老提供的信息。1996年6月，女青年陈红将其参加全国玻纤大赛荣获一等奖的奖金2000元捐给纪念馆，成为瞿秋白铜像基金捐款第一人。丁老得知后，很快率子女捐款1000元。看到瞿秋白铜像在秋白百年诞辰时矗立在新建的纪念馆陈列大厅，丁老连说“交关开心”。

五

丁老对瞿秋白的一往情深，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。他所著《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札记》1958年6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初版；他和文操合编《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》1959年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，其中收录了《瞿秋白笔名、别名集录》。

丁老以为，弄清瞿秋白在著译中曾用的各种笔名和别名，以及用这些笔名、别名撰写的文章，才能全面地研究瞿秋白的著作。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，他潜心研究，反复求证，去伪存真，融研究于考辨之后，更以巨大的勇气与超前的眼光，为全面、系统、深入地研究瞿秋白探明了路径，《瞿秋白笔名、别名集录》成为瞿秋白研究和搜检有关资料的工具书，更为20世纪80年代编辑14卷《瞿秋白文集》提供了许多便利。

1994年6月18日，秋白就义59周年纪念日，瞿秋白纪念馆、瞿秋白研究会在常州联合举办“丁氏父子瞿秋白研究学术报告会”，丁老和言模父子两代长期以来坚守和传承瞿秋白研究且硕果累累。如今，丁言模、刘小中编著《瞿秋白年谱详编》成为又一本瞿秋白研究的工具书。言模子承父业，《瞿秋白佚文考辨》等研究系列丛书已出版七本，成为新世纪以来瞿秋白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。

2002年我退休后，丁老继续扶持和牵挂着瞿秋白纪念馆第二、三任馆长以及纪念馆的发展。30多年来，他始终与瞿秋白纪念馆保持着密切联系。

潘光旦部分藏书归去来兮

■柳已青

当年7月26日，潘光旦原准备离家南行的日子。考虑到万一时局变化如何处理，他交代妻子，如有变故，可率女儿逃难，只需带走他手录的一册书目留作纪念即可，而不必考虑其丰富的藏书。南行不成，潘光旦返家后的第三日，将祖先遗墨与家谱旧稿等装入一个箱子，在第一次进城时先送存城内报房胡同的寓所。又嘱仆

人将全部藏书逐日装存，一星期才毕，共装28箱，拟护送至城里妥善收藏，再找机会南运。此时，他忆及明末屈大均送顾炎武诗，有“飘零且觅藏书洞，慷慨休听出塞歌”句，竟似对己吟咏一般！

从8月5日至月底，清华大学校务会四名成员潘光旦、沈履、冯友兰、吴有训，每天聚在一起，半天办公，晚上则在校长住宅与其他留校同人相见，一起读路透社消息，听无线电广播，“陷虏以后，犹不至

沉闷抑郁以死者，赖有此耳。”

1946年，潘光旦重返清华。他战前存放城内的书籍命运如何？潘乃穆《回忆父亲潘光旦》文中说：“战前存放城内的三十箱图书、稿件等均已遗失，无踪可寻。其中有一部分藏书后来居然陆续从旧书摊上买回。”在旧书摊邂逅多年前自己失散的藏书，那感觉，如同破镜重圆吧。失而复得令人惊喜，也更令人倍加珍惜。